

文学应表现复杂的内心生活

如今,这个旋转的世界越来越复杂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逆反——文学仿佛越来越简单了。文学之中的价值判断、观念、意识、情绪……总之,文学之中的内心生活越来越简单了。没有矛盾,没有含混和犹豫,没有快感和厌恶混杂的模糊地带,也没有激烈之后的恐惧、后悔或者怜悯。所有的人物内心都是一条笔直的单行道,他们旋风般地扑向情节和主题的终点,兴高采烈地凯旋于大结局。这就是我们与经典作家的距离了。对于众多遭受欺凌的底层小人物,鲁迅的内心交织了多种情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人们甚至可以认为,激进的抗争是革命者的号召,悲天悯人是一个作家的情怀。无论是《祝福》《孔乙己》还是《阿Q正传》,悲天悯人的情怀更像是这些小说成为杰作的原因。我们记得,文学始终保持了一个同情弱者的传统。弱者通常是竞争之中的失败者,能力低下。工商管理教学分析的案例之中,他们是成功者的垫脚石。然而,文学往往在通常的社会评价之外保留了另一种眼光。同情、关怀、尊重,甚至在某些时刻的景仰——这就是文学的复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多愁善感”是一个肯定的评价。如果说,种种理论模型和概念术语是经济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手里的利刃,那么,“多愁善感”则是作家理解社会和人物的独特资本。无论如何,文学必须对内心生活的空间及其复杂多变做出充分的估计。无数的生活细节闪烁出奇特的面目,这个庞大的生活区域交付给纤细而又敏感的内心。文学负责记录内心,记录这里的潜流、回旋、聚散以及种种不明不白的波动和辟屑。某些时候,这一切可能在历史之中汇成一个醒目的潮汐;另一些时候,复杂的内心生活仅仅是历史边缘的回流,甚至仅仅是历史不得不偿付的代价。但是,这个区域顽固地存在,这个区域的意义只能由文学显示。

现在,人们必须解除二者的通约关系——许多时候,复杂的内心生活无法依附于紧张的情节。那些获得满堂喝彩的作家常常提供一个眼花缭乱的世界,翻云覆雨,一波三折;然而,真正的杰作仿佛更乐于盯住平庸的日常生活,欲望、欢悦、志得意满与负疚、烦恼甚至梦魇搅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有人或许会疑问:展颜一笑难道不比以泪洗面或者看破红尘有利身心健康吗?文学又有什么必要那么复杂呢?从财富的分配到制度设计,从历史的远景规划到社区的安全设施,我们的身边一切就绪——文学何必多事地揭开所谓的内心生活,增添各种杂音呢?文学的答复是,内心生活始终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没有进入人们内心的历史又有多少意义呢?无视复杂的价值观念、意识、情绪,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者法学家得不到历史的完整答案,每秒运算1000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亦无能为力。如果文学放弃责任,如果文学杜撰的悲欢离合仅仅是一些玩笑般的游戏,那么,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将会留下一个无法填补的缺口。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6月29日 南帆 文

实行多年的我国现行职称评审制度,近年来显现的弊端越来越多。这些弊端长期得不到根除,造成了恶劣的负面影响。其主要表现如下:

1.陈旧过时的评审手段,变相鼓励造假。目前不少单位的职称评审领导小组,依然按照实行了多年的条条框框进行评审,要求参评者有论文、有著作。实际上,评审领导小组的成员,对于申请评定职称的人,他们应该是了解的,要考核他们的真实能力、水平,并不是很困难。可是,假论文拿来了,假著作拿来了,居然还能派上用场。原本知道某些人该评上中、高级职称,为什么不坚持评审原则呢?道理很简单,评职称和用人是两回事。

2.职称变成了“待遇”,与使用人才严重脱钩。不少单位的职称评审,不是严格按照职称评审条件进行严格把关。他们屈从于“官本位”的高压,对于能够担任中层领导职务者,

一般可以享受副高职称。以此类推,高级行政领导,一律全享受高级职称。没当上官的工作人员,熬够了年头给个中级职称就算混得不错了。职称评审的领导者,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要求他们公平公正,那是不可能的。道理很简单,他们占着高级职称本身,就是典型的不公正。职称一旦和意义紧紧挂钩,就失去了职称存在的意义。这样做,职称的贬值是不言而喻的。

3.职称的“近亲繁殖”让职称评审走进了死胡同,最终无路可走。绝大多数数单位的职称评审,不是优中选优,更不是宁缺毋滥。他们居然怕浪费了“名额”,以“破格”的名义,降低职称评审标准,把根本不够标准的人,突击拉进中高级职称队伍。趁此

机会,一些评审“要员”大搞权钱、权色交易。不少庸人、弱智、低能者纷纷获得了中、高级职称。职称几年评审一次,评上的人素质却越来越差,可就是这样,仍是照评不误,职称评审能不走下坡路吗?

4.中高级职称沦为“低能者”的代名词,是这个时代的悲哀。谁也不否认,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才辈出应该是社会的正常现象。如果发现,那些有高级职称的人,全是一些“吃吗吗香,干啥啥不行”的主儿,而没有高级职称的人,既是实干家,又是饱学之士。那这样的职称评审结果,就不是很可笑的事情了,那将是极其可惜了。社会不公真的到了那样的程度,那将是危险的。

摘自《北京文学》第10期 孙理 文

到底什么是散文?我以为构成散文最可宝贵的两个因素是这样两句话:独特的感悟,自由的抒发。可贵在“独特”,尤其在“自由”!吴冠中生前对我亲口说:“离开感情深邃的意蕴,笔墨等于零。”鲁迅激赞曹操“是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其文章“清峻”、“通脱”、“简约严明”,“想写的便能写出来”。鲁迅这里所说的“通脱”,“想写的便能写出来”,就是自由的抒发。自由抒发什么呢?当然是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

我们当前的散文所欠缺的,恰恰是散文作家主体精神的缺失,前怕狼、后怕虎,辞藻华丽而思想贫乏,无不感动却少有震撼。

毛泽东1957年说过:“现在还是放的不够。”这句话,我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时作为文章的标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二十多年过去,仍然面临着思想解放得够还是不够的问题。一些读者认为好的散文作品不但

不要见钱手软

不能评论,而且不让发行;即便准予发行,评奖却不允许,宁肯把印制好的一大批获奖作品集全部封存。后来,作者的散文集都准许上架,但封存的获奖作品集仍然压着。

散文年度选集较多,这是好事,各人心里一杆秤,但是个人化的、有个人风格特点的选集并不多。和散文作者必须具备独特的感悟和自由的抒发一样,选集编者也应排除一切非艺术的干扰自由表达主体的意识和兴味。有的选本言行不一,说他们这批编者大海里捞针,反反复复遴选,如何如何认真,其实是大话惑众,怎么能畅销怎么来。

现在的评奖不只一种,官方民间一齐上,这很好,也希望在评奖过程中对读者和作者负责,一篇一篇地读,一本一本地评,不要远离文本,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

给出血者留一个……

我多年前曾经同韩小蕙交谈,问起当前文艺状况,我说了四句话:“作家要表现,政府要宣传,读者要好看,书商要赚钱。”文人同商人联姻之后,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就要变味。

散文写作较之报告文学写作,不能说“不差钱”,所以,散文作品要开研讨会就很困难,拉不到钱,谁给你开会,谁给你写评论,写出评论谁给你发表?对于这种情况,我很替一般写作者着急,也为好货被埋没而心痛。怎么办呢?同情同情弱者吧!

能拉到钱的作者开研讨会,但有的研讨会实在不敢恭维。与会者读就读了,没读就没读,没读完就说没读完,不要装蒜;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去掉最高分,再去掉最低分,不要见钱手软,为了眼前的什么而失掉自己宝贵的什么。

摘自《中国文化报》10月9日 阎纲 文

“书香”与“慢读”

“书香”绝非爱书文人的“大话”,以旧式印刷品的油墨味混和樟脑丸“臭味”产生的独特气味,在“读书人”嗅觉里便是“书香”。不过,这种“书香”今已难见。铅印书不管平装精装或“豪装”,俱淡然无味,纵有“香味”(如“豪装”书封面散发不能称为香味的软胶味),在空调环境下亦很快消散;用经过“科学处理”以驱蠹鱼以杜虫蛀的杂木实木做成的书架书柜,当然亦无半点木香而油漆气味不过数月便消失于大气中!家中书架或挤塞或疏落的书,不论是不经意的存书或刻意经营的藏书,都有非电子书所能企及的“功能”,我们常见若干中外学者作家以至社会贤达回忆儿时受家中满壁图书的感染,偷读“禁书”或一知半解地硬啃经典从此爱上读书并养成终生爱书习惯的往事,可见家中有书确好处处(如果你不以为爱读书是坏事)。

据7月20日《华尔街日报》消息,亚马逊指其Kindle在“逆境”中销量大增——其售价从259美元降至189美元后,销量便增三倍;西雅图一书店每卖100本精装书便卖180“本”电子书,电子书真是来势汹汹。可是,电子书亦有缺点,而且是足以改变人性的大缺点。7月17日英国《卫报》有《慢读的艺术》(《The Art of Slow Reading》)一文,痛陈电子书(及网络信息)令人“蠢化”(stupider)之害,因为上网的目的在求多求快,上网者无法元神归一、深入钻研,读起来更是囫圇吞枣,结果纵有得益亦流于肤浅表面化,于其智性的提升并无受惠。一如如今主张“慢食”(slow food,有益健康)及“慢游”(slow travel,五天七国游可以休矣)渐成主流,“慢读运动”(slow reading movement,原来莎士比亚和尼采都曾作此主张)正在酝酿中。“慢读”意味全神贯注,这样的阅读才能带来乐趣和进益(读到不合理或文理不通处亦知弃之;时间最宝贵,经济学家因此主张“读不下去的书,应马上放弃”)。Kindle只是“中途宿舍”,而且会令人思想跳跃,不能集中精神(如此什么事都做不好)……从读好书到读书好,最好是捧书慢读,如此才能把书中的养分充分吸收!

摘自《书城》10月号 林行止 文

今年上海电影节曾流传出这样一个笑话,一位煤老板找到导演彭浩翔说:“你给我拍一部文艺片,但要让我女朋友当女主角,去国外参加电影节!”

故事从侧面反映了文化产业投资的虚热。资本趋利的本性、经济回暖的驱动,正促使境内、境外各路资金潮涌文化领域,炒电影、炒艺术品、炒新媒体、炒文化产业园区,成为不少财大气粗的“金主”又一个选择。

首先是电影产业。各种业外资本对电影的热情堪称史无前例,电影市场迅速成为各行各业的掘金宝地。其次是动漫和网游,尽管这两个产业门类投资热情高涨,但产业投入与产出还相距甚远。艺术品市场回暖更快,新的成交纪录不断诞生,值得注意的是,在拍卖纪录背后是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和神秘买家,他们持有的海量资金常常使得一件拍品直达“天价”。大量热钱涌入文化产业的原因,

一方面得力于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10年《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等利好政策的不断出台,推动文化产业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亮点,也使得文化资本对文化产业未来的规模和潜力抱有更加乐观的期望。另一方面在于银根宽松、流动资金过剩,各种社会资本难觅出口,高速崛起的文化产业便成为很多“外行人”眼中掘金的热土。

仅以电影产业为例,从今年6月份开始,每月上映的电影数量就已经进入饱和状态,平均每天都有新片上映。然而,这些影片中能真正获利的屈指可数,十赌九输已经成为投资电影产业残酷的现实。与票房收入增长速度相比,中国海外电影销售和各电

行核实。事实上,储蓄实名制在税收监管和遏制震慑非法收入、防止官员腐败方面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另外,实名制在实行过程中的异化,不仅让人爱不起来,甚至还让人望而生畏,从本能上加以拒绝。其主要原因,就是少数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权力滥用,无限放大了实名制的管制功能,利用实名制限制打压言论自由、压制公众意见的事件屡屡发生。同时,因实名制获得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或个人随意泄露、转让,出售个人信息成为牟利工具,有的甚至给公民带来人身之祸。

社会和公众都需要实名制,需要它来维护正常秩序和保护公民权利,但却不要沦为不良秩序形成的土壤和公民权利流失的黑洞。

摘自《人民论坛》第18期 李克杰 文

不久前辞世的美国作家J.D.塞林格1951年推出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版再版,吸引了好几代读者,累计发行量达到6000万册之巨。塞林格这部十余万字的作品,成了一个意蕴丰富的文化符号,集中体现了上世纪50年代美国一代人的心声,而作品中的主人公,则戴着红色鸭舌帽的霍尔顿·考尔菲德则成了无数人心仪的偶像。关于霍尔顿,很多人将他视为美国文学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他身上有着某种罕有的品质,正是这一品质使霍尔顿多年来葆有着他的魅力。

《麦田里的守望者》开篇第一句便定下了全书的基调:“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所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霉的童年是怎样度过,我父母在生我之前干些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卫·科波菲尔式废话,可我老实告诉你,我无意识告诉你这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后的十余万字无非是这一主题的延伸、生发、衍射、变调、重现。你能在这一长句中嗅到什么呢?愤懑、高傲、厌烦、一点点满不在乎、一点点挑剔。虽然他很弱小,尚未成年,除了较为富裕的家境外,一无所有,而且还是一个屡次被学校开除的问题少年,但他并不因之气馁、自卑。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曾是霍尔顿,只不过性格、环境、机缘、时代没有使他们像霍尔顿那样荒废学业,无所事事,东游西逛,玩个过瘾。我们谁不曾对学校的清规戒律充满憎厌之情,谁不曾畏惧繁重的课业,谁不曾鄙视师长和同辈的鸡鸣狗盗、平庸乏味,谁不曾对人生的意义产生过诸多惶惑,只是我们适时将青春期的反叛能量转移了、升华了,没有让它燃成不可收拾的熊熊大火。在理想主义高涨的年代,青春的热情会酿成蔚为壮观的社会奇景,在上世纪60年代,霍尔顿的同道在欧美各大校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他们的理想已不仅仅止于隐居、独善其身,而且是要改造世界。时过境迁,理想主义的热潮已难觅踪影,而在当今拜金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中,新一代人在重读《麦田里的守望者》之际,难保不产生强烈的共鸣。共鸣之余,更多的是无奈。和上一代人相比,他们多了世故、谨慎和玩世不恭。历史上太多的悲剧和骗局让人们不敢轻易将心灵托付给一个简单明了的理想。尽管如此,我们在心中还是情不自禁地喜欢霍尔顿,认同他的方式,甚至跃跃欲试地仿效一番。

那个“十分、十分奇怪的孩子”在哪里?塞林格的撒手西去并没有将他带离人世,它已在大地上扎下根来,它蛰伏、潜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

摘自《文汇报》10月8日 王宏图 文

明星扎堆儿,谁有精力领悟献礼意义呢

赵本山在和《建党伟业》制片方商量档期时,突然希望让小沈阳演个角色,没有台词和片酬都行。结果很快得到了答复:角色可以有。照这劲头,估计这部献礼大片都不用找群众演员了。鸿篇巨制有明星号召力,明星有票房号召力,如今这成了国产大片的成功定势。但电影除了看演员,更要看情节取胜。明星扎堆儿,观众又要看幻灯片、做认明星游戏了,谁还有精力领悟献礼的意义呢?

摘自《北京晨报》9月27日,孟浩强 文

警惕文化资本助“吹”经济泡沫

影频道广告收入的增幅尚不足前者的1/5,产业发展极不平衡。

房地产、煤炭、风投等业外资本的“热情参与”,令文化产业风生水起,但风险也不容小觑。这些热钱大都急功近利,希望马上看到回报,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出品的文化产品难免存在硬伤。如果说10年前投融资需要靠政府、资金支持,房地产补贴钱是产业发展的瓶颈,那么今天,发展方式的不合理、发展格局的不均衡,将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最大隐忧:“捞一票”的功利心态、热钱逐利的投机行为,将成为制造文化经济泡沫的最大暗器。

文化产业巨大的市场空间与产业远景告诉我们,应该警惕与经济领域同样性质的“GDP挂帅”和“增长主义”导致的虚热。

摘自《人民日报》10月8日 李舫 文

日本的阅读推广活动

“这才回过神,到站该下了!”这是今年日本第64届读书周的广告语。秋季是日本文化教育活动最活跃的季节。读书周从10月27日到11月9日,为期两周。在此期间,全国的图书馆和教育委员会将举办各种阅读推广活动,比如面向孩子的朗读会、旧书交换、阅读讨论等等。该活动由日本图书馆协会在1924年创办,疫情期间一度中断。到了战后的1947年,协会联手书店、媒体等30多个团体,成立“读书周实行委员会”,“读书周”以全新面貌推出。当时的目标是“以阅读为礼,建立和平的文化国家”。这个运动的反响巨大,第二年开始就扩展到全国,成为了一种国民活动。

1959年,活动主办方更名为“读书推进运动协会”,1969年被改组为社团法人。该协会不只在深秋忙碌,春天的“儿童读书周”,初秋9月的“敬老日读书推荐”、“推荐给年轻人的书籍”等活动贯穿全年,将各年龄层的读者都考虑到了。

日本出版社也善于创造读书潮流。新潮社、角川书店、集英社就常举办“夏日100册”阅读活动。这一营销活动已有30多年的历史,每到7、8月份,出版社会从自家文库中选出100种,把书单做成精美的宣传册,在各书店免费派发。新潮社还开发了熊猫型吉祥物“Yonda(中译:读了吗?)”为卡通代言,“夏日100册”活动时它也会来帮忙。出版社推出100册的同时,会按照购买量提供赠品,另外还有特别设计的包书纸等,激发了消费者的收集欲。该活动最初是在1976年由新潮社创办的,之后角川书店和集英社也纷纷跟进,合力培养出了“夏天=读书”的国民心理。

阅读推广不是件容易事,需要经年累月的辛勤工作。上述两条道路,一为官方公益引导,二为出版社商业推广,都锲而不舍地做了多年,或可给中国文化界人士一些参考。

摘自《南方周末》9月29日 吉井忍 文

我国城市发展模式需改变 北京堵车现象折射

“绿色交通,低碳生活”,“无车日”倡导的理念无比正确,也是疗治中国大城市交通病的最好良药,但对生活在北京等中国超大城市的人们来说,这剂良药过于苦口。

超常规发展的地铁和公交,“几乎白坐”的票价,却丝毫也挡不住北京人的购车热。汽车保有量的疯狂增速,迅速吞噬了北京道路建设的成果,全中国无出其右的6条环路,同样无出其右立交桥数量和道路之宽、车道之多,但还是被汽车保有量的爆炸式增长甩在后面。

在北京,让市民接受“无车日”理念,不买车、少开车,其难度,丝毫不亚于治理拥堵本身。这是北京历史形成、又被后来规划强化的不合理城市格局造成的后果之一。摊大饼式发展,不断向城市边缘延伸的房地产开发,把许多在城市中心区住不起的上班族吸引到与工作地点越来越远的边缘大型社区安家居住,使得市民上下班路途越来越远,距离市中心20公里以外的“睡城”越来越多。在这些“睡城”,缺乏工作机会,缺乏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无论为了上班,还是为了孩子上学、老人就医,私家车几乎成了必备工具。

要改变这种状况,固然需要加快轨道交通建设,加大道路建设投入,需要交通部门努力,但终究需要整个城市规划的调整,城市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北京只是蓬勃发展的中国城市中的一个代表。

交通拥堵也只是“大城市病”的征象之一。虽然国家提出的城镇化提速,着眼于中小城市,然而中国大城市的资源汲取能力,必然会吸引更多人口的涌入,“逃离北上广”,恐怕只是媒体制造的噱头,据预计,到2015年,北京人口将超过2000万。靠传统的城市管理手段,改变不了这个总体趋势,随之而来的环境、水资源、治安、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住房、社保的压力,全面考验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大城市。

可以预期,这是中国改革发展要过的“大关”之一。这道关口,需要各个城市拿出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办法与措施,更有赖于整个发展方式的转变。而无论统筹城乡发展、公平分配公共资源、公共服务均等化,都是实现包括大城市在内整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9月16日,胡锦涛主席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致辞中提出要实现“包容性增长”,让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治疗城市病的药方,最根本的还是让发展“包容”与“普惠”,这是解决交通问题及所有大城市问题的关键之所。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9月29日



路怒族

罗琪 作

摘自新漫网

又爱又恨“实名制”

“实名制”在我国出现的历史不长,从最初的储蓄实名制开始,到现在只有10年。公众和社会对实名制的情感,可以用4个字形容,“又爱又恨”。

10年中,我们已在全国或部分地区和行业相继实行了储蓄实名制、金融账户实名制、医院看病实名制、旅馆登记实名制、网店经营实名制、航空购票实名制以及火车票实名制等等。正准备实行和启动的还有包括网络论坛、博客、微博、QQ群等在内的实名制。然而,不少事项的实名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使制度发生变异,与人们当初的设想和希望存在不小的距离。

比如,网店实名制很有可能仅仅是

为网上征税做铺垫,预示网络交易征税渐行渐近,而对于网店的经营活动、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恐怕没有人相信会因为实名制而有实质性改变,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店面经营都管不好,大量假冒伪劣及欺诈行为都未能实施有效监管,又怎能管好虚拟化的网店呢?

已经实施10年的储蓄实名制,至今只实现了第一层意义上的实名制,即存款采用实名。而由于各家银行的电脑网络多属于自家银行系统的内部网络,是局部的、区域的,而非公用性的网络,因此造成了银行与银行之间、银行与户籍管理机关之间、银行与税收征收机构之间互不联网,各自为政。这一结构性缺陷使得银行无法通过网络资源,按照实名制的要求对储户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及其在银行存款的其他个人情况资料进

戏仿文已经终结了吗

亚里士多德把戏仿文确定为一种文学方式,从乔叟时代的作品中便能找到英语戏仿文的例子,但这种写作形式的黄金时代是在19世纪,那时文学成为中产阶级陶冶情操和逗闷子的主要方式,文学游戏成为流行的娱乐方式,戏仿就是一种基本的文字游戏。美国幽默作家E.B.怀特写过一篇《过街人烤肉店》,戏仿海明威的《过河人林》,厄普代克戏仿过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文件、哲学和思想学派都是很好的戏仿目标。美国作家亨利·门肯戏仿过《独立宣言》。澳大利亚作家保罗·詹宁斯戏仿过存在主义,“大部分戏仿文就像寄生虫……当被戏仿的文章没人读时,戏仿文也就没人读了。”但不时会有一些戏仿作品拥有神

奇的生命力,当其中的模仿元素变得无法辨认时,它们自己也还活得好端端的。格罗斯说,现在的一些模仿文作者写得跟以前最佳的作者一样好。美国学者路易斯·海南德为《纽约客》的评论则认为,如今戏仿文已经终结了。“从上世纪60年代起,文学已经不再是中产阶级主要的文化爱好,本真和戏仿之间的屏障坍塌了。人人都去戏仿,文化中充斥着对戏仿的戏仿。低层次是这样(戏仿电视广告的广告广告),高层次也是如此(后现代小说)……结果一种文化产品如果不首先取笑自己就不会受到认真对待。这种做法部分是出于自我保护;如果你已经在颠覆自己,别人就很难去颠覆你了。但自我戏仿也可能是有意识从权威的。当一切都不是半戏仿的,一切都把自己呈现为有意识的夸张,戏仿这种形式就终结了,变得跟真实的东西没有区别。”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9月27日 小贝 文